

林达作品系列

linda

历史在你我身边

林达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林达作品系列

linda

历史在你我身边

林达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在你我身边 / 林达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9

(林达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5017-5

I. ①历… II. ①林…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4295 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装帧设计 张 婷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 数 220 千字 图 109 幅

印 数 00,001—20,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 代序：我是这样认识三联书店的

林 达

1995年年底，我带着“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一部书稿《历史深处的忧虑》回国，其实当时连书名都还没有。

书稿内容基于我作为平民在美国的体验，讲述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向中国朋友介绍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个人权利”概念，更强调美国民众为此在不同时代怎样支付不同代价。我还记得，作为一个普通新移民，写作有很放松的一面，同时，在国内的经历又无可避免成为一个背景，致使写作中也常常出现一些“重”的心情，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用轻松笔调让文字自然流淌。新一代也许已经很难理解，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会有如此心情。今天回头去看，这不是“个人事件”，它折射了中国一段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我们成长的年代，适逢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一度完全挤压了个人空间，这类话题也就长期成为禁区。1976年“文革”结束，直至整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府权力的合理退让和个

人对自由开放的急切要求还不同步，形成了社会的焦点之一。虽然这本书不是对个人自由的盲目呼唤，而是在介绍个人权利理念的同时，也提醒了这些命题中蕴含的社会两难困境：在必要的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同时，社会和民众也被迫在“安全”与“自由”的冲突中不断权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难题。这一点，在今天世界进入反恐战争时期之后，又有了新的含义。可是经历了八十年代末，1996年的中国社会还在一个门槛上，这样的话题虽不再是绝对禁区，却仍然敏感。对于作者来说，历史甚至现实的负担也都还在。所以，当时的写作心情，其实也在无形中预示寻求出版的困难。

那年回到上海，先把稿子寄给了在北京的朋友郭大平，他把稿子转给他的朋友郑也夫，还记得他说，“也夫的眼睛比较毒”。接下来，郑也夫热心表示愿意帮助推荐出版。于是，1996年年初我带着书稿来到北京。在十几天的时间里，郑也夫帮助推荐了路数不同的各家出版社，也包括私营书商的前驱者。几乎所有出版社对书稿本身的反应都是正面的，却也都明确表示，因书的主题敏感，不能出。记得有一个总编刚开始看，就立即否定了出版的可能，却不肯马上归还书稿，说是自己喜欢，一定要看完了再还。出现的最大可能，是一家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已经接下稿子，提出出版条件，一是要删改，二是给样书不给稿费。我们都答应了。接下来，编辑小心翼翼做了大量工作，删去他估计可能触电的字句，尽可能保留原来的内容。返回来的稿子五花八门，看得出编辑的全部苦心和好意。可是，删节稿还是被总编无奈地否决了。期间，周孝正说，我替你向也夫求个序吧。记得是一起吃着小饭铺，孝正开了口，也夫只是回了一句：“我觉着这本书要出事儿。”结果，临出版前应出版社要求，我自己匆匆忙忙补了个

序，也因为这句话，当时帮过忙的朋友，一个都没有敢在书中表示感谢。那是后话了。

郭大平、郎可华夫妇，周孝正，郑也夫，梁平，史铁生、陈希米夫妇，都帮了很多忙。当时没有找三联书店，也夫的意见是，这样敏感的稿子怕“显眼”，找个“不惹眼”的出版社，还可能“塞出去”。结果，铜墙铁壁，怎么也塞不出去。我不能无休止地在北京待下去，临走，留下一份稿子给周孝正，托他有机会再给别家试试。然后我就回了上海。临行，郑也夫给了一个朱学勤的地址和电话。说这是他的朋友，可以试试请他帮忙。

说实话我不知道谁是朱学勤。我先打电话约了时间，把郑也夫的名字推在前面。朱学勤家当时还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一个简陋的宿舍楼。为有事相求而敲开一个陌生人的门，本身就是件尴尬事情，好在朱学勤受朋友之托很是热情，不问三七二十一抓起电话就打给上海的一家文学出版社。我急着拦住他，请他先了解一下书稿内容再说。事后他说，当时他估计一定又是一本“闯荡曼哈顿”的故事。我简单介绍之后，朱学勤的脸色才从客气的热情转到真正的兴趣：他看重“形而中”，而这本书稿正是介绍制度层面的东西。书稿在讲些浅显好听的故事，也就面对大众。这种方式其实是跟美国人学来的。这次，朱学勤认真了，要先留下书稿读一读。

几天后，收到朱学勤电话，说是他把稿子推荐给了三联书店。绕了这么一大圈，才提到主题，是想说，三联书店确有它和别家不同、十分特别的地方。朱学勤是认真的，他先给编辑吴彬打了电话，又把稿子直接寄了过去，吴彬对书稿持肯定意见，又转给了总经理董秀玉。总经理还是拍板的关键，为最后落实，朱学勤又直接打电

话给董秀玉，催问对书稿究竟如何定夺。朱学勤告诉我说，总经理董秀玉在电话中问他，你对书的判断怎么样？听完朱学勤的介绍和推荐，她马上回答，三联愿意出这本书。我听了想，这种行事风格，好像有点“旧社会”。

我回美后不久，适逢朱学勤第一次到美国，来我家玩。那是1996年5月，问他三联那里怎么样了。他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就在我老住宅破破的小房间里，立即给三联编辑吴彬打了个电话。回答是：通过了。朱学勤这才松口气说，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原来在打电话前，他其实并没有把握，原因是不久前，三联又来了一位新领导，谁也不了解他，谁也不敢保证能通过。现在编辑说：他签字了。唯一的要求是，这本书不要宣传。朱学勤加了一句，也是好人啊。

出书前还有一个周折：这本书的第一个书名是《自由与代价》，希望能够一目了然地点出书的内容。

在个人自由尚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地方，对自由的呼唤往往是文学性的，充满了浪漫抒情甚至热血沸腾的激情表达，自由仅仅呈现它感性的一面，如裴多菲笔下生命、爱情的理想续篇。这也是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离开中国时，看到和感受到的中国知识阶层以及社会大众诠释自由的基本层面。若要再往前回顾，这条线索可以一直牵到中国最初引入西方文化的开端处。而我在这本书里，想介绍的自由概念是冷静的，可以陈述和理性讨论、可以现实规范的。个人自由不仅是具体的，也是仰仗他人和社会支付代价而得以维护的，这些代价同样是具体的。因此，美国的自由是由无数案例作为支撑的，是对个人行为、政府行为的司法界定。而所谓案例，又是

触及每一个人现实生活的鲜活故事。同样的案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可能引出对司法规范新的挑战 and 突破。每当遭遇新的历史条件，而社会可能一时无力支付新的代价时，某些个人权利就难以得到历史上同样程度的维护，整个社会就会陷入痛苦挣扎的困境。美国正是由于对历史标杆性案例的判定和由此引发的广泛社会讨论，才使得社会从困境中逐步成熟。没有“代价”的同时引入，仅仅引入浪漫概念的自由是极为脆弱和不完整的。

可是，在当时情况下，书名出现“自由”二字是出版社需要再三斟酌的事情。考虑再三，编辑还是决定不采用《自由与代价》的书名，结果书名就改成了《历史深处的忧虑》，后来不少读者反映说书名有点不知所云，这不是有意故弄玄虚，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书名的“自由”不存，“代价”也只好随之而去。值得欣慰的是，到了2007年，我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介绍纳粹集中营里犹太儿童画作的书，此刻编辑吴彬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为书起名为《像自由一样美丽》——中国的社会进步真是非常具体。只是，直至今日，我们还是看到，中国的自由呼吁仍然非常容易流于感性表层，而能够对“自由和代价”作透彻的社会思考、扎扎实实在司法层面落实，还是相当欠缺的一块。前路漫漫，需要努力的道路依然漫长。

通过审批后又等了一年。1997年5月，这本书悄悄地出版。编辑吴彬保持了稿子的原貌，基本没有什么删改。我们后来长久合作，吴彬习惯并不多说什么，然而专业、自有定力，假如提出意见，总在点子上。

大家都看到了，那本书出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个坎儿迈过，大家松了一口气。下一本《总统是靠不住的》已经出得非

常轻松。出版界在这一言论层次上的困扰也在无形中消失。大家又往前走了一步。走在前面的是三联书店。

这书“要出事儿”，几乎是1996年初所有退回书稿的出版社总编的判断，话说得更悬的都有。这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环境。回头想想，这种紧张形成的心理压力是一种恶性循环。人们有话憋着不让说，就憋得血压高，憋出一口高压锅来。到一定程度，就算想开盖也不敢开了。其实，让一个原本紧张的社会逐渐松弛下来，是可能做到的。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也需要共同的智慧和勇气。现在的新一代无法想象我讲述的当年故事，其实也就是刚过了十来年。

迄今为止，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好多本书了，现在这些书放到哪里也都可以出，不会有问题。我却始终无法忘记，在1996年的那个门槛上，三联书店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目 录

001 代序：我是这样认识三联书店的

001 巴金和伏尔泰

006 一百年前的细节

015 “杀君马者道旁儿”

029 一段“佳话”

032 在边城历史中穿行

040 穿越颠倒岁月的女孩

044 划定“罪与非罪”的界限

052 一个中国拳王的故事

069 相遇三次的朋友

082 一个老人和一段历史

106 新闻牵出的历史

114 我们是不是走出了盲点

138 莱霍夫和他的电影纪录片

154 半个世纪的独特行走

161	读《考古学一百五十年》
170	殖民者和语言考古
180	访印度的亚洲学学会
184	希望有一天，我们只谈常识
187	印度式拆迁
194	圣雄甘地和非暴力之父
216	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信仰之路
235	祖母的祷告词
245	神秘的石阵
258	怎样打破“官官相护”的规律
265	“第一个死刑犯”的前前后后
275	阿米绪人的智慧
285	自律与诚信
295	走向安全之路
303	从历史中驶来的橘黄色校车
311	辛普森说——假如我真的干了
317	“好贼教堂”的故事
322	“金色克里姆特”的归宿
338	值得反省的“版画事件”
345	那个李松松
349	大师作品背后的“羞涩笑容”

我写过一篇短文，提到自己的一点惊讶：回看人们悼念巴金，几乎全都会忽略巴金之所以为巴金的文学大师身份，而极度推崇他“提倡讲真话”的“社会良心”形象。

我觉得当时自己想说的话在文章中没有完全说出来，想在这里把它说完。其实我一直转不过弯来的是，人们在赞誉巴金是社会良心的时候，好像是给了巴金一种更高的评价，好像“文学大师”只是一个“专业人员”，“专业成就”一笔带过就可以，而“社会良心”才是升华后的道德形象，值得大书特书。

想到这一点，不由自主会想起有着类似称号的法国启蒙时代大师伏尔泰。伏尔泰还有一个称号，人们称他为“欧洲的良心”。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伏尔泰不是一个痛苦不堪的革命家形象，他一生都过得挺滋润。他游走在欧洲各国，交往的何止是文化人和思想者，更有达官贵人



伏尔泰

甚至帝王将相。伏尔泰是他们的座上客，接受他们的招待和资助，过着优裕的生活。伏尔泰很会享受生活，善于投资和经营。他是法国人，他先行一步的思想，既受到变革中的欧洲宫廷，包括法国宫廷的欢迎，而这些思想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又使得法国宫廷感到威胁。因此，法国宫廷对伏尔泰的感受是矛盾的。可是，伏尔泰是一个非常善于调节自己状态的人，他远离巴黎，却不把居于边境小镇看作是一种放逐，因此也并不怨天尤人甚或怒不可遏，他把小镇经营成自己的天堂，生活的常态一点不变。

可就在晚年，他突然卷入一系列平民案件。于是他开始像一个法律工作者一样，开始他的调查，并且根据调查，出版他调查的原始文件。这些案子发生在法国从古代司法向现代司法过渡的途中。这种过渡是随着社会进步缓慢发生的，也就迟缓和不那么均衡，巴

黎等大城市相对快一些，然而，古代的司法黑暗还残留在边远地区。

伏尔泰介入的第一个案件是“卡拉斯案”，由于他的努力，冤屈者的家属得到著名律师的免费帮助，得到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欧洲国家君主们的捐款，最后法国路易王朝的政府纠正了这个错案，家属获得了赔偿。

伏尔泰看到，这些冤案往往和古欧洲遗留的落后、宗教偏见、宗教迫害有关。在介入这些案件的时候，他在思索，把导致这些案件发生的人类弱点进行了清理，写出了《论容忍》等一系列论著，把古代社会的宗教褊狭以及人类的不宽容点了出来。所以，伏尔泰不仅是在纠正几个案子、帮助几家平民，更是由实践而思想，在推动人类的思想进步和社会进步。他在一个迷茫中摸索着前进的社会里点出了关键：在人类从一向就自生自灭的古代社会脱胎出来的过程中，他指出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必要性，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则要求多数的宽容。

我又想到巴金。巴金生长在一个现代社会。在他成长的岁月里，已经接触了各种成熟的思想，此时伏尔泰已经是两百年前的老古董了。而那时的中国还是世界发展的边缘，还有《家》这样的家。巴金用文学细致深入地剖析了这样的“家”和社会、“家”和人、社会和人之间的关系。那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巨著。两百年前伏尔泰不仅是一个写着悲剧、史诗的文学大师，他还是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有哪个真正的文学大师又可能不是思想家呢？巴金无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他和伏尔泰做着同样的事情，就是在—一个逐渐变革进步的社会中起到启蒙的作用。谁能说，写出《家》、《春》、《秋》的文学大师的巴金，不是“社会良心”的象征？在那个



巴金

时候，巴金就已经是中国的伏尔泰了。

可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们似乎觉得，文学家依据自己的感觉写出作品影响读者；教师敬业地传授知识教育学生；律师认真为客户打官司维护普通人的权益，都不足以被称为“社会良心”，我们需要的是以特殊的呐喊方式影响社会的人。于是，在三十年前，巴金应我们社会的特殊需要，成为这样一个“社会良心”。直到今天，人们还认为，他对社会的一句教导是如此重要，分量重到今天我们悼念巴金的时候，可以一笔带过他成为大师的文学成就而再三强调他的这句话。那么，他究竟说了什么？他说的是：我们要“讲真话”。巴金提倡“讲真话”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他去世的2005年，这一提倡仍比他的文学成就更受到赞誉。

一路想来，我只好承认自己真是一个很愚钝的人，会很愚钝地

想，巴金从文学大师到“社会良心”的身份转换，对他个人、对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高度赞扬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错位，它的前提是什么？也许并不是晚年巴金比青年巴金更为伟大，而是社会本身的低层次错乱，基本人伦常识被淹没在高调之中。按照常识，在一个正常社会，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文学家努力于他的文学创作，把“讲真话”的教育工作，留给托儿所和幼儿园的老师。在巴金去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深感惋惜：《家》、《春》、《秋》没有续集！《随想录》是历史的特定产物，与前面的文学巨著相比，无法等量齐观。

| 一百年前的细节

和许多人一样，我很喜欢看传记和回忆录。我觉得这一类作品要想写得好，首要的条件是平实。平实就是落点比较低，也注重记录事实——真实发生的事情、真实有过的想法。这样的作品在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今天再回过头来细察和品味，除了能看到当年真实的记录外，还能产生回看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

好的传记和回忆录作品，其实也是珍贵的民间历史记录。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多半会发现，历史常常从寻常人的头顶越过，百姓的真实生活很难真正进入历史学家的视线。

历史学家注重记录的大多是上层政治的演变、精英思想的走向，史书中有的是改朝换代的跌宕起伏和围绕宫廷的阴谋诡计，却往往找不到微小个人是如何被历史浪潮所推动的记录，也找不到对历史事件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柴米油盐、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路径，甚至左右了我们喜怒哀乐的记录。我想说的是：大历史的走向，实际上